

以资源禀赋为基，打造“旅居昭通”新坐标

大信集团(云南)有限公司 张冬书

当历史的车轮与高铁的轨道在乌蒙山脉交会，一场关于空间价值重估的变革正在悄然孕育。昭通深改委第十四次会议擘画的“旅居昭通”蓝图，不仅是一项产业规划，更是地处滇川黔鄂交界的昭通在时代变迁中重新确立自身坐标的文明自觉。这片曾以“锁钥南滇，咽喉西蜀”著称的土地，正站在从地理枢纽迈向生活枢纽的历史节点上。

一、禀赋之思：超越“优势转化”的命题
昭通所持“金矿”，内涵之丰富，远超寻常认知。其价值不在单项之突出，而在禀赋结构之独特与协同：

时空禀赋。渝昆高铁将重构区域地理格局。昔日的乌蒙古道将化为瞬息可达的“生活走廊”，使昭通从地理节点跃升为连接成渝与滇中两大城市群的“中间花园”。此非单纯交通升级，而是从根本上改变区域人力、资本与信息流的空间联系格局，为旅居产业提供底层动力。

自然禀赋。此地夏无酷暑，年均气温适宜，乃天赋之“清凉资本”。金沙水拍、峡谷幽深，大山包之辽阔，黄连河之秀润，构成层次丰富的生态景观。这不只是“景观”，更是可体验、可栖居的“生命支持系统”，为现代人提供了稀缺的身心安顿空间。

人文禀赋。朱提银铜之光，昭示千年工巧精神；南方丝绸之路与五尺道遗迹，蕴含着开放交流的古老基因；扎西会议烽火，映照着转折时刻的坚定信念；多民族共生共融，积淀了温润和谐的生活智慧。此乃塑造旅居独特魅力与精神厚度的无形之瑰宝。

存量禀赋。散落城乡的旧宅、老街、古村与闲置资产，皆是镌刻着时间肌理、承载着地方记忆的“空间文本”。它们并非闲置无用的资源，而是兼具轻资产、高弹性、深内涵特质的优质开发载体，是连接过往、通向未来，实现文化与价值创造性转化的关键媒介。

然而，丰厚的资源禀赋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发展优势。若仅以静态占有视之，不以动态运营与创造性转化用之，则宝藏亦

可能成为负累。汉代桓宽《盐铁论》有言：“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利，不在力耕。”今之“术数”与“势利”，正在于超越性思维，将天赋资源转化为市场优势与生活魅力。

二、破局之钥：从“地理存量”到“体验流量”

破解之道，在于彻底摒弃“坐拥宝山而不善用”的保守心态，完成三大关键转变：

其一，从“资源思维”转向“场景思维”。资源是物理存在，场景则是情感体验与意义生成的空间。旅居之核，不在“观”，而在“居”；不在“短暂停留”，而在“生活片段”。需以“场景营造”为核心，将山水、气候、文化与现代人居需求巧妙结合，打造如“峡谷星眠”“古道茶居”“半山康养社群”等具有强烈叙事性和感染力的生活场景，让资源在人的体验中“活”起来。

其二，从“项目思维”转向“生态思维”。旅居并非孤立景点的简单集合，而是由特色小镇、精品民宿、文化聚落、户外线路、社区服务等创意思维交织而成的共生系统。应借鉴生态学“关键种”概念，重点培育那些能衍生、吸附、带动多元业态的“旗舰型旅居社区”，形成自组织、自演化的产业生态。政府角色应从“主导建设者”转为“生态培育者”与“规则设计者”，构建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其三，从“标准化思维”转向“在地化思维”。真正的文旅吸引力源于不可替代的独特性。需深挖“昭通性”——那种由独特地理、气候、历史与人文共同凝结的“地方精神”。在建筑形式、材质选用、业态组合、服务细节乃至节庆活动中，均应在在地文化以当代、优雅的方式自然流露，避免千篇一律的复制品。晋人陆机《文赋》言：“石韞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在地性便是昭通旅居的“玉”与“珠”。

三、远瞻之谋：打造“旅居昭通”新坐标的三重想象

基于上述思考，打造“旅居昭通”新坐标可作三层递进式想象。

想象一：“气候人文经济学”的典范

区。超越单纯的避暑经济局限，创立“气候价值+”的深度开发模式。将昭通的宜人气候与中医药养生、森林康养、高原体育、静修禅悟、艺术创作等业态深度融合，设计“昭通四季疗愈历”，针对不同体质、不同心境、不同创作需求的群体，提供定制化、周期性的旅居方案，让昭通成为调节身心、激发灵感、实现高质量“内在时间”的生活目的地。

想象二：“存量资产文艺复兴”的实验场。发起“昭通空间重生计划”，系统普查并创意评估各类存量资产。引入“轻介入、微改造、精提升”的当代设计理念与灵活的运营运营模式（如EPCC、社区产权式运营等），让旧商号变身文化客厅，让老村落成为艺术家群落，让闲置校舍转化为自然教育基地。每一处活化都是一次与历史的对话、一次社区的复兴、一次新旧共生的美学实践。

想象三：“枢纽型旅居生活圈”的构建者。借力渝昆高铁，昭通应立志成为区域性“旅居生活服务中心”——不仅要吸引游客前来短住体验，更要吸引人才、资金、创意资源中长期驻留。为此，需构建一套完善的软性基础设施，涵盖远程办公支持、高品质的教育医疗合作、高效的产权服务、丰富的社群活动等，让旅居者既能拥抱自然、享受生活，也能兼顾事业，使昭通成为成渝、滇中都市圈精英人群的“第二生活空间”或“阶段性工作栖居地”，实现从“过境地”到“目的地”再到“生活地”的深刻转变。

昭通，不应止于一城一池的旅游产值，而应以自身的山水形胜、气候节律与人文积淀，为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提供一种关于生活本质的别样答案——一种从容、健康、与自然及历史和谐共处的生活可能。

昭通所谋，既需秉持“计利当计天下利”的理念，广纳四方智慧与资本；亦需有“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定力，深耕品质、涵养文化底蕴。唯有如此，方能使“旅居昭通”从一张蓝图化为一令人心驰神往的文明风景，在“旅居云南”的宏大版图上，真正散发出不可替代的温暖光芒。

党建赋能县域治理现代化

——基于镇雄实践的理论与创新路径

镇雄县融媒体中心 陈东

党的建设是县域高质量发展的“根”与“魂”。镇雄县立足170余万人口的县情、多民族聚居的地域特征和劳务输出大县的特殊禀赋，以党建为引领，在产业发展、民族团结、基层治理、队伍建设等领域探索出一系列务实有效的创新举措，既破解了县域发展中的现实难题，又丰富了新时代基层党建的实践内涵，为党建引领县域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

一、党建引领产业融合：筑牢共同富裕治理根基

产业兴旺是县域发展的核心动能，而党组织则是产业发展的“红色引擎”。镇雄县坚持“产业发展到哪里，党组织就建到哪里，作用就发挥到哪里”理念，将党建工作与产业布局深度融合，通过组织链串联产业链、激活人才链、带动利益链，实现党建强、产业兴、群众富的良性循环。

在破解“就业顾家两难”的民生痛点中，镇雄县以党建为纽带，创新推行“家门口的务工车间”发展模式。立足全县10.2万五金工、9.8万纺织工的人力资源优势，各级党组织牵头盘活老校舍、老厂房等闲置资源，累计盘活闲置厂房5.73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五金高新、纺织服装、特色农产品加工等特色产业园区，让群众实现“就业不离乡、顾家不误工”。

在破解“就业顾家两难”的民生痛点中，镇雄县以党建为纽带，创新推行“家门口的务工车间”发展模式。立足全县10.2万五金工、9.8万纺织工的人力资源优势，各级党组织牵头盘活老校舍、老厂房等闲置资源，累计盘活闲置厂房5.73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五金高新、纺织服装、特色农产品加工等特色产业园区，让群众实现“就业不离乡、顾家不误工”。

在破解“就业顾家两难”的民生痛点中，镇雄县以党建为纽带，创新推行“家门口的务工车间”发展模式。立足全县10.2万五金工、9.8万纺织工的人力资源优势，各级党组织牵头盘活老校舍、老厂房等闲置资源，累计盘活闲置厂房5.73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五金高新、纺织服装、特色农产品加工等特色产业园区，让群众实现“就业不离乡、顾家不误工”。

在破解“就业顾家两难”的民生痛点中，镇雄县以党建为纽带，创新推行“家门口的务工车间”发展模式。立足全县10.2万五金工、9.8万纺织工的人力资源优势，各级党组织牵头盘活老校舍、老厂房等闲置资源，累计盘活闲置厂房5.73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五金高新、纺织服装、特色农产品加工等特色产业园区，让群众实现“就业不离乡、顾家不误工”。

在破解“就业顾家两难”的民生痛点中，镇雄县以党建为纽带，创新推行“家门口的务工车间”发展模式。立足全县10.2万五金工、9.8万纺织工的人力资源优势，各级党组织牵头盘活老校舍、老厂房等闲置资源，累计盘活闲置厂房5.73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五金高新、纺织服装、特色农产品加工等特色产业园区，让群众实现“就业不离乡、顾家不误工”。

在破解“就业顾家两难”的民生痛点中，镇雄县以党建为纽带，创新推行“家门口的务工车间”发展模式。立足全县10.2万五金工、9.8万纺织工的人力资源优势，各级党组织牵头盘活老校舍、老厂房等闲置资源，累计盘活闲置厂房5.73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五金高新、纺织服装、特色农产品加工等特色产业园区，让群众实现“就业不离乡、顾家不误工”。

上，坚持政治标准与民族工作能力并重，择优选配6名少数民族干部担任乡镇“一把手”，选拔各族群众信赖的党员进入村(社区)党组织班子，实施“领头雁”培育计划，提升基层党组织引领民族地区发展的能力。例如，果珠彝族乡纳文寨通过党组织牵头，完善道路、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发展民俗旅游，带动村民人均年收入提升10%，成为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的典范。

在治理创新上，果珠乡推行“基层党建+社会治理”模式，构建“党员+警员+网格员”治理体系，组建5支由村干部、党员、乡贤等86人组成的联合工作队，同时划片划分904个微网格，通过“十户联防”机制化解矛盾纠纷144件，练就了一张兼具法律刚性、乡情温度的“暖心网”。全县通过建立“民族团结联创、区域发展联建”互动机制，组织开展民族节庆联办、文化集市等活动，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流、全面交流，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党建引领下常开长盛。

三、党建激活基层治理：创新共建共享实践路径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党建则是打通这一环节的关键抓手。镇雄县紧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2+5”工作机制，创新推出“121”自治模式，将治理重心下移，服务资源下沉，实现从“干部干、群众看”到“共建共治共享”的转变。

在乡村治理中，镇雄县构建“议事小组—片区议事会—村级议事会”三级议事体系，成立村级议事会262个、片区议事会906个、议事小组5437个，实现治理组织全覆盖。通过“围炉夜话”“坝坝议事”等载体，把“话筒”交给群众，让群众从治理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场坝镇仓房村通过议事会机制，按照“政府补贴建材、党员带头投工、群众主动参与”模式，仅用一个月就完成4.43公里村组道路硬化工程；雨河镇大坪村通过议事会收集民意，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安装223盏太阳能路灯，既照亮了村民的出行路，更打通了基层干部的“民心路”。为确保治理透明高效，镇雄县推行“议事选题、过程、结果”三公开机制，同时通过“向上争、户筹、能人捐、集体添”的“四个一”模式汇聚资源，破解了基层治理“资金缺、力量弱”难题。

在城市治理中，镇雄县针对新就业群体需求，打造“古邦温‘新’了我，我心融入了古邦”党建品牌，建设37个“云岭先锋新家园”，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提供充电休息、技能培训等“一站式”服务，破解骑手“进门难、找路难、停车难”问题，创新选聘21名骑手担任社区网格员，64名骑手担任“古邦新骑手”，赋予其安全隐患排查、矛盾纠纷调解、政策宣传等职责，让新就业群体从“治理对象”变为“治理力

量”。在防灾减灾等重点工作中，木卓镇新桥村将4公里河道划分为4个党员责任区，建立31个防汛微网络，实行“点对点提醒叫应、户联户帮群联”工作法，实现连续9年汛期零人员伤亡，彰显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战效能。

四、党建锻造过硬队伍：夯实县域发展人才支撑

党员队伍是党建工作的核心力量，队伍建设的质量直接决定党建工作的成效。镇雄县聚焦“培训谁、训什么、怎么训”三大核心问题，构建分级分类、精准高效的党员教育培训体系，推动农村党员队伍高质量发展，为县域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在培训对象上，镇雄县全面摸清农村党员底数，从年龄、就业、身体状况等维度细致分类，以5年为周期拟定培训计划，确保农村党员进乡镇党校培训全覆盖。在培训内容上，制定《党员基本培训课程清单》，确保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学时占比超过50%，同时组织县委党校教师开展“送课下乡”58次，将理论政策直接送到党员身边。创新推行“1+1”案例教学模式，即组织党员学习优秀地区经验，同时邀请优秀村党组织书记、党员代表走上讲台，通过“书记教书记、党员教党员”的互动教学，切实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在培训体系上，构建“县乡两级培训、乡级兜底培训、村级常态培训”三级联动机制，充分发挥县委党校主阵地作用，重点培训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和优秀农村党员，同时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制度抓好日常教育，让党员教育培训融入日常、抓在经常。

这支经过系统培育的党员队伍，在各条战线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在产业发展中带头创业、带动就业，在民族团结中主动作为、促进融合，在基层治理中冲锋在前、服务群众，成为推动镇雄县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和“先锋队”。彰显了新时代农村党员队伍的过硬作风和责任担当。

镇雄县的党建实践，以问题为导向，以实效为目标，走出了一条具有县域特色的党建创新之路。其核心启示在于：党建工作必须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才能避免“两张皮”，彰显实践价值；必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才能赢得民心、凝聚合力；必须创新方式方法，才能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必须建强党员队伍，才能筑牢根基、激发活力。

镇雄县的实践充分证明，基层党建只有立足实际、精准发力，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优势，才能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新时代推进基层党建创新，需要我们立足实际开展更多实践探索，以创造性举措破解发展难题，以务实作风服务人民群众，不断深化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创新，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新质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质态跃升，加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建设农业强国、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的核心要求。农业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主导，高素质劳动者为支撑，先进生产装备为基础，绿色低碳为导向，摆脱传统农业对土地、劳动力的粗放依赖，实现生产效率、产品质量、资源利用与生态效益协同提升，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新时代农业发展中的创造性运用。

我国正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跨越，乡村产业进入业态创新、动能转换、质量提升新阶段。昭通作为滇东北地区重点城市、云南省农业大市，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区域，需全面落实省委“3815”战略部署，深入实施“六大战略”，扎实做好“产、城、人”三篇文章，以建设农业强市为目标，依托高原特色农业资源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

近年来，农产品精深加工、乡村康养、直播电商、生态循环农业等新业态在昭通呈现快速发展态势，推动农业从单一生产功能向“生产+加工+服务”的多元功能转型，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了实践载体。但昭通新业态仍处于初级发育、点状突破阶段，存在创新驱动能力不足、产业融合程度不深、要素保障相对薄弱、经营主体发展能力不强等问题，新业态向新质生产力的转化效能偏低，与农业强市建设及省级战略要求相比存在差距。本文立足昭通“产、城、人”发展实践，进一步深化新业态与农业新质生产力之间的耦合机理研究，破解发展瓶颈、探索落地路径，为同类地区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提供借鉴。

一、乡村新业态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在关联

契合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核心要义：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本质是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与生产方式创新变革的系统性升级。乡村新业态通过产业融合、要素集聚、模式创新，推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农业生产要素重组，打破传统农业边界与发展模式，推动生产方式向集约型、多元型、现代型转型，为农业新质生产力提供理论支撑。

统一于乡村振兴与农业强国建设：农业新质生产力以破解传统农业发展瓶颈、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乡村新业态以农业为根基，融合科技、文化、康养、数字等要素，聚焦高效生产、价值挖掘、绿色发展、农民增收，其发展理念及目标指向与农业新质生产力高度耦合，统一于乡村全面振兴与农业强国建设的具体实践。

昭通依托高原特色、绿色有机、错峰上市优势，推进“一县一业”“一村一品”，苹果、竹子、马铃薯、天麻等特色产业规模居全省前列。新业态推动特色农业从“卖产品”向“卖风景、卖体验、卖服务、卖品牌”转型，拓展农业价值空间、激活乡村发展动能，契合农业新质生产力提质增效、绿色富民要求，与“以产兴城、以城聚人、以人兴产”逻辑高度一致。

新业态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实践场景：农业新质生产力需依托具体产业场景落地转化。乡村新业态为科技创新、先进装备、经营理念转化为实际效益架起桥梁；共享农庄、田园综合体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智慧农业、数字农场提升生产智能化；精深加工、预制菜等产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直播电商、产地仓物流产业推动产销进城通道，推动新质生产力从理论走向实践。

双向赋能形成良性发展循环：新业态对技术、要素、管理提出更高要求，倒逼农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为新质生产力注入动力；农业新质生产力以科技、要素、模式创新，为新业态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这一机制与昭通“产、城、人”实践深度融合，助力形成“产兴、城旺、人聚、力强”的良性发展闭环。

二、融合发展的现实瓶颈

创新驱动能力薄弱，技术供给与转化滞后：昭通农业科技研发存在研发与需求脱节、成果与应用脱节的突出问题，产学研协同机制不健全，本土化实用技术研发投入不足，生物育种、山地农机、精深加工等关键技术突破进展有限。先进技术、智能装备普及率偏低，科技成果转化渠道不畅，农业科技人才引进、留不住，基层推广能力薄弱，创新支撑作用未充分释放。

产业融合层次较低，价值链锁定与同质化突出：产业融合处于浅层化、低水平阶段，多数业态集中在初级生产环节，精深加工、品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薄弱，陷入价值链“中端锁定”困境。农文旅、乡村康养等融合业态多为“采摘+餐饮+住宿”的简单组合，对昭通本土地域文化挖掘不深，导致业态特色不鲜明、同质化严重。特色农产品规模优势明显，但全国性公用品牌与自主品牌缺乏，品牌溢价能力与市场竞争力不强。

经营主体能力偏弱，人才要素结构性短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小、实力弱，规范化水平低，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标准化生产与市场化运营能力不足；农业龙头企业数量少、带动能力有限。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精电商的复合型人才匮乏，城乡发展差距导致高素质人才返乡意愿低，本土农民技能素质难以适应新业态发展需求，加之人才培养、激励、保障机制不健全，人才短缺已成为制约农业与新业态深度融合的关键瓶颈。

要素保障机制不完善，资源配置效率偏低：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规模化经营水平偏低，闲置资源盘活困难，产业发展用地保障不足；金融支持力度较弱，信贷产品单一、融资成本较高，社会资本参与积极性不高；农村数字基础设施覆盖不足，数据、技术等新型生产要素应用有限，市场化配置与成果转化激励机制不完善。

体制机制不健全，政策协同与执行效能

不足：部门统筹协调机制缺失，农业、文旅、电商、科技等部门各自为政，政策协同性差；扶持政策缺乏系统性与针对性，以资金补贴为主，技术、人才、品牌等方面支持不足，政策宣传与落实不到位；行业标准与监管体系缺失，存在无序发展、恶性竞争等现象，影响高质量发展。

三、以“产、城、人”融合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

紧扣云南省委“3815”战略部署目标与昭通“产、城、人”部署要求，以创新驱动为核心、产业融合为路径、主体培育为基础、要素保障为支撑、机制创新为保障，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强化创新驱动，构建产学研用协同技术体系：坚持科技创新的核心地位，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高校支撑、科研院所参与、市场导向”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聚焦苹果、天麻、特色果蔬等优势产业，加大生物育种、山地农机、精深加工、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研发力度，形成本土化实用科技成果。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推动科技成果与经营主体精准对接，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的步伐。

加快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5G、物联网、人工智能在农业全产业链的应用，打造智慧农场、数字果园、智能加工车间等示范场景。实施人才引育计划，吸引高端技术与经营管理人才返乡创业，开展新型职业农民、新业态从业人员、基层农技推广人员技能培训，夯实智力支撑。

深化产业融合，构建全链条多元产业体系：推动新业态从点状突破向体系化发展，构建“生产+加工+流通+服务”全链条产业体系。延伸特色产业链，发展精深加工，开发高附加值产品，提升加工转化率与产品增值率，培育链主型企业、提升产业链整合能力。

依托生态与文化产业，推动农业与文旅、康养、研学、文创深度融合，打造特色农庄、田园综合体、农研研学基地，开发高品质体验产品，有效破解同质化竞争。推动农业与大健康产业融合，发展中医药养生、生态康养等新业态。整合“昭品”资源，做强区域公用品牌与企业自主品牌，强化质量管理与宣传推广，提升品牌影响力。完善产地仓、分拣中心、冷链物流设施，规范发展直播电商，畅通农产品流通渠道。

培育经营主体，构建市场化协同主体体系：构建“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协同发展格局。加大龙头企业扶持力度，支持科技创新、品牌打造与产业链整合，发挥引领带动作用。规范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发展质效，推动标准化生产、规范化管理、市场化运营，鼓励其抱团发展，提升规模竞争力。

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村集体”模式，通过保底收购、分红返利、股份合作等方式，建立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共享发展红利，激发其参与积极性。

优化要素配置，构建高效可持续保障体系：强化土地要素保障，健全土地流转机制，推进规模化经营，盘活闲置宅基地与集体建设用地，保障新业态用地需求，完善用地转换机制。强化资本要素供给，创新金融产品、简化审批流程、降低利率，破解融资难题；加大财政涉农资金统筹力度，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形成多元投融资格局。强化数据与技术赋能，建设农业数字服务平台，完善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与成果转化激励机制，推动要素高效聚集。

健全体制机制，构建协同长效制度体系：建立跨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农业、文旅、科技、金融等资源，形成工作合力。制定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扶持政策，加大创新、人才、品牌、要素保障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推动政策落地见效。完善行业标准与监管体系，规范市场秩序，整治无序竞争与虚假宣传。深化“产、城、人”融合，以产业聚人、以城留人、以人兴产，为新质生产力培育营造良好环境。

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乡村新业态是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与关键路径。二者深度融合，既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实践，也是昭通做好“产、城、人”文章、建设农业强市的现实选择。

昭通立足乌蒙山区资源禀赋与农业大市实际，紧扣省级战略部署，以创新、融合、主体、要素、机制五大维度协同发力，破解发展瓶颈，推动新业态提质增效、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必将加快从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跨越的步伐，为滇东北乃至全省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实践借鉴，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云南篇章、打造昭通实践样板贡献坚实的农业力量。

以乡村新业态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

——基于昭通“产、城、人”实践路径的探析

绥江县委党校 王贵科